

刘火雄 著

邹韬奋与中国 现代出版转型



南京大学出版社

邹韬奋与 中国现代出版转型

刘火雄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邹韬奋与中国现代出版转型/刘火雄著.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8.12

ISBN 978-7-305-19611-9

I. ①邹… II. ①刘… III. ①邹韬奋(1895—1944)
—人物研究②出版事业—文化史—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K825.42②G239.2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86813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书 名 邹韬奋与中国现代出版转型
著 者 刘火雄
责任编辑 郭艳娟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南通印刷总厂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张 8.125 字数 210 千
版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9611-9
定 价 32.00 元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 njupress
销售咨询 (025)83594756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丛书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编 聂震宁

主 编 张志强

委 员 陈海燕 江 莹 姜迎春

金鑫荣 聂震宁 任子光

孙建军 杨海平 张志强

总 序

商务印书馆元老张元济先生曾言：“盖出版之事，可以提携多数国民，似比教育少数英才尤要。”古往今来，出版早已成为人类文明的播种机、社会进步的发动机。

南京大学是国内最早开展出版教育的高校之一。1928年，南京大学前身之一的金陵大学开设了图书专修科，包括“重要书籍研究”、“图书流通”等课程。1985年，南京大学恢复图书馆学系。翌年，图书馆学专业硕士学位点获得批准。1987年，学校在图书馆学硕士点下设立了编辑出版研究专业方向，开始培养出版方向的研究生。图书馆学侧重对图书的流通、收藏、利用等方面的研究，而编辑出版学侧重于图书的生产制作。通过这样的学科设置，一个从图书生产、流通到典藏、利用的完整环节形成了。1993年，南京大学编辑出版学本科专业开始招生。1998年，南京大学出版科学研究所成立，这是当时全国高校中为数不多的研究所之一。2003年，出版科学研究所与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的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合作，联合培养出版管理方向的公共管理硕士（MPA）。2006年，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设立“新闻出版总署南京大学出版人才培养基地”。同年，南京大学设立了华东地区第一个出版学

博士点。2009年,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委托,南京大学出版学学科点与南京大学研究生院牵头论证了我国设置出版硕士专业学位议题。2010年,出版硕士设置方案获国家有关部门批准。2011年,该学科点成为全国出版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秘书处所在单位,是目前南京大学唯一的一个专业学位秘书处。

2012年,在时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洪银兴教授的大力支持下,在原中国出版集团总裁聂震宁编审的努力下,江苏亚东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向南京大学首批捐款200万元,作为南京大学出版研究专项基金,用于筹建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2012年12月,在南京大学编辑出版学学科点的基础上,整合学校相关力量,学校发文成立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

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以建设成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出版研究智库和出版教育培训机构为目标,全力推进出版学研究。编纂出版研究丛书是其中的一项重要战略。作为出版研究院的成果之一,该系列丛书致力于对我国出版理论与历史、出版实务、数字出版与文化产业发展等方面的研究,力求为我国出版业改革发展、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提供智力支持。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时下,受技术驱动的出版业,正处于新一轮变革转型期。数字出版、媒体融合、知识服务一日千里。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将顺势而为、应时而变,紧扣时代与社会发展需要,为更多“弄潮儿”脱颖而出提供全方位的支持,最终服务于我国文化强国的建设。

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丛书编辑委员会

2017年12月

目 录

绪论 / 001

- 一、研究背景：现代出版转型基本路径和历史语境 / 003
- 二、问题提出：民国知识分子与书报刊互动关系 / 008
- 三、研究回顾：邹韬奋研究视角嬗变及其主要成果 / 014
- 四、研究理论与方法 / 022
- 五、研究框架 / 023

第一章 职业出版人身份认同与建构 / 025

第一节 从撰稿人向出版人的身份转换 / 027

- 一、新闻理想的自我启蒙 / 027
- 二、《生活》周刊早期的编辑理念 / 032
- 三、转型担任《生活》周刊主编 / 035

第二节 主编角色及其功能 / 038

- 一、栏目设置与调适 / 038
- 二、完善组稿机制 / 045

三、编创者之间的精神交往 / 052

第三节 生活书店经营管理创新 / 054

一、协调编辑工作与广告业务 / 055

二、人才招聘制度设计与组织建设 / 057

三、合作经济制度及民主管理 / 062

第二章 国民性关怀及其话语谱系 / 071

第一节 国民性关怀与大众启蒙 / 074

一、民生凋敝及其救济 / 074

二、批判陈规陋俗与崇洋媚外 / 077

三、“他者”镜像中的国人形象 / 080

四、从现实关怀到大众启蒙 / 085

第二节 揭批官僚政治与媒介监督 / 088

一、揭露政府官员贪腐奢靡 / 089

二、为整顿吏治建言献策 / 095

三、文人论政传统的回响 / 099

第三节 反讽话语谱系分析 / 102

一、践行大众话语写作 / 103

二、“反讽”手法及其“陌生化”效果 / 105

三、话语与权力关系 / 109

第三章 抗日救亡时局中的媒介议程 / 113

第一节 日军暴行与汉奸批判 / 116

一、报道日本侵华企图与计划 / 116

二、揭露日军侵华暴行 / 119

三、汉奸批判 / 123

第二节 抗战宣传与鼓动 / 128

一、坚信抗战必胜 / 129

二、开展抗战募捐 / 133

三、反对投降主义 / 134

四、强化自主抗战认识 / 139

第三节 民族主义价值认同及建国理想 / 142

一、宣扬文化抗战 / 143

二、呼吁全民抗战 / 145

三、知识分子的救亡努力 / 147

四、建国理想憧憬 / 149

第四章 出版自由与民主政治思想演进 / 153

第一节 国民政府书报刊审查 / 155

一、查禁《生活》周刊、《大众生活》 / 156

二、封锁生活书店 / 165

三、谣言攻击 / 173

第二节 言论自由与战时民主政治诉求 / 178

一、为言论自由鼓与呼 / 178

二、借助媒介推进民主政治 / 182

三、声援宪政运动 / 186

第三节 接受共产主义信仰 / 190

一、无党派办刊立场 / 191

004 / 邹韬奋与中国现代出版转型

二、“拥共”立场的确证 / 193

三、邹韬奋、张元济交谊例析 / 203

结语 / 219

一、邹韬奋与启蒙现代性 / 221

二、知识分子的话语空间与批判立场 / 223

三、新闻出版业的多元治理模式 / 225

参考文献 / 227

后记 / 244

绪 论

晚清民国知识分子群体中许多人通过书报刊媒介，实现了自我赋权，从而以其丰富学识和道义责任，对公共事务发出独立声音……一大批慷慨人士，为中国的新闻出版业鼓与呼，谱写了各自的华章，在不同领域筚路蓝缕，开启着中国现代出版的文化山林。

晚清以降，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潮冲击—中国反应”外向驱动模式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内生变革策略相互交织，带动着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多领域的现代转型。邹韬奋、胡愈之、徐伯昕等生活书店同人置身时代的滚滚洪流中，不断拓展所从事的新闻出版业务，如进行经营管理创新，报道都市生活，宣传抗战救国……无形中建构起一幅现代出版和转型的历史图景；他们自身的新闻出版人角色身份以及对出版自由、民主政治的诉求，与当代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新闻出版业有诸多相似语境和共通之处。

一、研究背景：现代出版转型基本路径和历史语境

在社会时代后浪推前浪的历史潮涌中，中国新闻出版业从传统向现代嬗变，载沉载浮，此消彼长。现代出版转型表征为以下新质：在器物层面主要指新印刷装帧形式特别是印刷术的革新；在政制层面主要指政府规制的调适，现代新闻出版体制以及企业管理制度的确立；在文化层面主要指传统文化的递演、西潮东渐及大众文化的勃兴；在道德精神层面主要指新职业伦理的建构和发展。现代出版及其转型不仅仅是一个历史分期的范畴，更是中国现代政治、思想、文化风云激荡、百家争鸣的场域。^①

① 有关现代出版转型的内涵和特征，聂震宁师、吴永贵等人士均已有所洞见。如聂震宁师在2012年9月举行的首届“中国—亚欧出版博览会论坛”上，对中国出版业的转型特点及其趋势等作了阐述，包括产业化转型、公益出版制度化转型、发展方式转型、战略重点转型、出版技术转型、国际出版合作转型。吴永贵则在其于2011年出版的著作《民国出版史》中对此作了界定。此类成果和探索对笔者深有启发。

虽然早在西汉初期中国就出现了邸报,其主要承担发布命令、书诏、章表、辞见等内容功能,此后,官刻、坊刻、私刻图书出版业几经迭变,多元并存,但中国现代书报刊出版业的兴起,主要靠西方传教士的推动,带有鲜明的“内生外驱”特征。西方传教士早期的出版活动,主观上基于传播福音需要,客观上给中国近现代出版业转型提供了物质和文化资源。1815年8月,《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由伦敦传教会传教士米怜与马礼逊创刊于马六甲,新闻史上普遍将其视为以中文出版的第一份现代定期报刊,如民国报人戈公振就将其视为“我国有正式报纸之始”^①。《特选撮要每月纪闻》、《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天下新闻》等传教士主办的报刊继而兴起,报刊馆逐渐由南洋、广州等地向上海集中,如林乐知编发《上海新报》、《万国公报》影响一时,后者于戊戌变法期间的发行量最高时达38000多份。随着墨海书馆、美华书馆、土山湾印书馆、广学会等在华教会出版机构的设立与扩容,中国现代新闻出版业格局初定。与此呼应,晚清及民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陆续涉足书报刊出版业,直至万涓成河,蔚为大观。如伍廷芳1858年在香港创办《中外新报》,这可谓中国近现代报刊的发轫。王韬主笔的《循环日报》发刊于1874年,该报成为中国报刊史上第一份以政论为主的报纸,主要推介政治改良主张。

传教士从事书报刊出版业或相关教育活动,对中国现代出版转型的影响显而易见:一方面,他们带来了西方的书报刊出版模式,如定期出版、书报刊联动编印等;一方面推动了铅印、石印等印刷技术的普及。逗号、顿号、破折号等新式标点,最初也是在传教士所主办的书报刊上试用并定型。影响更为深远的是,他们为中国哺育了出版人才。如商务印书馆创始人之一夏瑞芳,曾在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范约翰创立的清

^①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313。

心书院学习印刷知识，并结识了同窗好友鲍威恩、鲍武昌兄弟和高凤池等。他们与夏瑞芳联手于1897年在上海创办商务印书馆，成为中国现代印刷图书出版业嚆矢。此外，“传教士为了赢得中国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的好感，除了用新技术印刷宗教宣传品外，还翻译出版了一批反映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的中文书刊，从而拉开了近代出版内容结构调整的序幕”^①。梁启超、张元济、胡适、陈独秀等知识分子，同样在推动中国文化事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变革中无役不与。

中外学人有关知识分子的论述连篇累牍，早已汗牛充栋。追寻近代知识分子传统，许多论者视法国“德雷福斯事件”为滥觞。1898年，当中国正试图推行戊戌变法时，法国作家左拉为给遭受诬陷而被判终身监禁的犹太裔军官德雷福斯辩护，发表了致总统的公开信《我控诉》，赢得“知识分子”称号并享誉至今，法国知识分子由此“走出了‘为艺术而艺术’的林中空地，并警示他们担负起‘现代国家的道德守护者’的崇高天职”^②，其流风余韵一直延续至萨特、雷蒙·阿隆等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则与古代士人阶层有历史渊薮。中国古代士人阶层位居传统社会“四民”（士农工商）之首，因所处时代各异，主要体现为游士、卿士、名士、士大夫乃至高僧等群体形态。就精神义理而言，他们或如孔子“士志于道”，或如孟子“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抑或如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普遍抱有“修齐治平”情怀。但晚清至民国初期，在中国由封建专制向民主共和政体转轨的历史进程中，特别是科举制废除后，随着现代知识教育体系和新闻出版业的崛起，传统的士人阶层逐渐为现代知识分子群体所取代。要对知识分子

① 吴永贵.民国出版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8.

② 马克·里拉.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M].邓晓菁，王笑红，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148.

作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概念式界定，既是极大的理论挑战，也容易以偏概全、挂一漏万，但作为新式智识群体，他们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至少有以下共性：普遍具备专业化的知识、独立人格与自由思想，自觉维护社会正义，拥有良知。

晚清民国知识分子群体中许多人通过书报刊媒介，实现了自我赋权，从而以其丰富学识和道义责任，对公共事务发出独立声音。正如梁启超之于《时务报》、《新民丛报》，章太炎之于《苏报》，张元济之于商务印书馆，陆费逵之于中华书局，胡适、陈独秀之于《新青年》……一大批慷慨人士，为中国的新闻出版业鼓与呼，谱写了各自的华章，在不同领域筚路蓝缕，开启着中国现代出版的文化山林。

鸦片战争以后，积贫积弱已久的中国屡遭外敌欺凌，受此时局影响，“启蒙”、“救亡”、“革命”这些时代命题凸显，进而逐渐演变为中国现代书报刊出版业的三重奏主题，这一历史轨迹至少延续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定于一尊前后。其间，维新士人、革命派、新文化知识群体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的报刊编辑出版实践百舸争流、竞合共生。《循环日报》创刊词写道：“本报所载上的有关政事之得失，足以验证国运之兴衰，足以察风俗之厚薄。”^①康有为、黄遵宪等人所创办的《强学报》开宗明义，“敬告读者：目前的一切正处在开创时期，本报专门以寻求救国图强的学理为目的”^②。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维新吾民”为旨归，“笔者以为要想使旧的变为新的国家，首先使人民的思想呈现出新的面貌。中国之所以不能振兴，是由于人民智慧尚未开启，缺乏一种公法意识。所以本报针对这一问题，应采取融合中西方教

① 本局启事.循环日报[N].1874-2-4.

② 本局告白.强学报[N].1896-1-12.

育的方法，为我国的教育方针，广泛搜集政学理论为我国的知者之本”。^① 陈其美等人主持的《民国日报》，则以革命为鹄的：“本刊是革命的报纸，一切言论，均与中国唯一的革命党——国民党一致，一切反革命的言论，均在绝对摈弃之列。”^② 1919年，26岁的毛泽东开始在长沙主编《湘江评论》，激扬文字，反对强权，倡议民众大联合，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进行揭露和抨击：“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③

面对动荡、混乱的社会现实，被裹挟的知识分子如何自处，从来不是一个不证自明的议题。鲁迅曾自嘲“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胡适奉行范仲淹“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人生信条，梁漱溟有“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浩叹……中国知识分子群落中，尽管许多人的生活阅历、教育背景、政治诉求迥异，但他们试图以各自方式在危机社会中重建秩序与追寻意义，特别是普遍借助新兴的书报刊媒介来推介新知、传播思想、宣扬主张，其方式或保守，或自由，或激进，均殊途同归于以各自努力来实现民族独立、国家现代化这一宏大理想与愿景。“在晚清民初的民族自强运动中，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界的整体解释可以被理解为对国家的合法性的一种论证，但他们要证明的不是原有的政治秩序的合法性，而是如何以及为什么必须通过变革去运用政治力量，实现那些对构成社会同一性具有

① 古敏. 头版头条：中国创刊词 [Z]. 北京：时事出版社，2005：47-48.

② 创刊词. 民国日报 [N]. 1916-1-22.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Z].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41.